

花

藏

鎮

印



章伯鋒 庄建平 主編

抗日戰爭

胡繩署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十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近代史研究所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成都



与大后方区域日见缩小,正面战场日见溃败的情况相反,敌后解放区已增到1亿人口、100万军队和200万民兵,成为中日军事交锋的主战场。敌后抗日游击战场的由小到大的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由点到面的成片壮大,并最终成为抗战的军事主力,这正是敌后游击战场的主要特征。

敌后游击战场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对军事谋略和战略战术的新发展。正面战场的阵地战战术,有极大的局限性。蒋介石由于迷恋于对日的政治解决,以外交渠道派密使往返与日本暗送秋波,幻想九国公约国出面调停,因而使正面战场的军事指导思想及战略战术出现一系列错误。如:单纯防御思想、死守硬拼的阵地战、消耗战等错误战法均带来对战局的不利影响。忻口会战、淞沪会战和徐州会战都是因为这种错误的指导而为日军有机可乘,被日军迂回包抄,切断退路而被围困,不得不败退。相反地,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所创造的抗日游击战争的一整套战略战术原则和办法,则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威力。日军怕共产党的游击战而不怕国民党的正规战。共产党提出的游击战方针原则,也影响于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他们也派人到共产党根据地来学习。战争的进程,说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越来越居于重要地位,在战略相持阶段甚至占据着主要地位,而正面战场的死拼硬夺的阵地战则越来越证明它的失误和失策。

总起来看,敌后游击战场与正面战场是整个抗日战争的军事斗争两个不可分离的进程。这两个战场的关系,同政治上国共两党又联系又斗争的关系一样,既互相配合支持,又互相影响制约,呈显出诸彩纷呈的交错复杂局面,都有各自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值得我们认真深入地加以研究。

谭继和

1997年5月

· 抗日战争 ·
章伯锋 庄建平 主编

第二卷

(上)

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

本卷编者

刘 萍	卞修跃	章伯锋	邹念之
荣维木	李仲明	刘建光	

· 抗日战争 ·
章伯锋 庄建平 主编

第二卷

(中)

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

本卷编者

刘 萍 卞修跃 章伯锋 邹念之
荣维木 李仲明 刘建光

· 抗日战争 ·
章伯锋 庄建平 主编

第二卷

(下)

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

本卷编者

刘 萍 卞修跃 章伯锋 邹念之
荣维木 李仲明 刘建光

第二卷 责任编辑 陈志学
徐燕
陈丽莉
责任校对 陈志学
徐燕
陈丽莉

前言

—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我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史上中华民族反抗日本军国主义的全面侵略并最后取得了彻底胜利的民族自卫战争。中国人民及其武装力量抵抗日本侵略军的军事战略作战和战役作战贯穿于整个战争的全过程。它主要是由正面战场的抗日作战与敌后战场的抗日游击作战两方面构成的。这两个战场相互依存和制约,相互支持和配合,均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各自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在抗日战争整个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等阶段进程中,随着日本侵略军的力量由强变弱,由军事胜利推进到最后彻底失败的发展历程,正面战场和敌后游击战场两个战场的力量和规模,地位和作用也发生了不同的发展和变化,二者呈现出复杂的关系。在民族抗战的威武雄壮的舞台上表演出波澜壮阔、起伏变幻的壮美活剧,最后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中国人民力量的空前壮大,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而告终。整个抗日战争军事作战的发展史,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观,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两个战场的存在及其错综复杂的关系,在近代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军事发展史上,在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军事发展史上,均占有极重要的不容抹煞的历史

地位。

本卷作为抗日战争军事资料的专卷,从汗牛充栋的作战史料中,搜集了具有典型性、代表性、能表现战争的规律和本质特征的两个战场的基本史料加以编排,借以对正面战场和敌后游击战场的基本情况作出全面的、客观的、真实的反映。这是本卷编选最突出的一个特点。

关于两个战场的作战史料有数千万字之多。编选者对所有史料都经过了一番爬梳剔抉,严格审视,历时五载,精选出近300万字的基本史料,既可供研究工作者研究之用,又可作为抗日军事发展史的教科书,这无疑是对广大读者和研究工作者的一个巨大奉献。

史料编选重在立例。本卷编选者均是富有经验、眼光新颖的史料学专家。除了在编选工作上遵守史学尽可能详尽地全面占有史料并给予科学审视和选择的共通性原则外,本卷在下列两方面的特点,特别体现出编选者的睿智和思考的深沉。

一是立例构思的严谨,所设计的体例和篇章结构体现出历史进程和逻辑发展的一致性。抗日战争的军事作战,牵涉着敌我友诸方面的军事行动,又经历着战略和战役乃至各个战斗交错变化发展的复杂过程。对这一复杂过程的史料,本卷编选者摈弃了一般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游击战场分别直线叙述、各不关联的编选方法,而是按照历史发展本身的进程,分别列出抗战初期的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抗战中期的敌我战略相持阶段和抗战最后的战略反攻阶段等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里两个战场的发展历程、敌我友作战方略和指导方针、计划和部署的确定和变化,两个战场的军事态势和军事力量的对比,战略、战役和战斗的作战经过及相互演变和相互关系,两个战场的胜败得失和交叉变化,两个战场相互协作和配合关系的时紧时松的变化以及日本对国民党诱降和利用的策略,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反共摩擦所带来的对两个战场的影响和恶果,等等,对所有这些问题,均按时期分阶

段,以重大战役为经,分正面战场、敌后战场和战争损失三大板块,交织为纬,纂组史料,加以逻辑的联系和叙述。这样,从横向看,两个战场相互交错,力量或消或长,战役或胜或败,地方或得或失,构成了战争史的战役战斗立体发展的宏伟画面。分阶段阅读本卷资料,可以比较深刻地理解两个战场发展变化、消长得失的本质。从纵向看,可以观察出日本的力量是如何由强变弱的,是如何由不可一世的军事胜利推进到无可奈何的最后彻底失败的;可以看出随着国共两党政治势力的力量朝相反方向行走和消长的情况,国民党所指挥的正面战场是如何由前期比较积极的抗战和力量的上升的情况,而向以后的消极抗战,力量下降,正面战场的节节溃退、丧师失地的情况转化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场如何由弱变强,由少到多,最后发展成为抗击日军的主体力量,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坚的。由此出发,可以对两个战场的战争规律和相互关系进行本质的研究,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的捷径,有助于至今还是空白的一部完整全面的抗日军事史的研究著作的出现。本卷编选者尤其匠心的是,每次战役里均增加了战争损失和日军暴行一项,在最后一篇里又增加了战争损失和战争索赔问题的专章,这有助于读者具体而微地理解日本侵略军的令人发指的暴行和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激发民族义愤,培育爱国主义情操。

二是编选的史料,既不遗漏反映各重要战役始末得失的基本原始资料,又注重发现和容纳新近发掘的史料,增加了本卷史料和论据的新颖性。关于这些史料的来源,已见于本卷附录引用书目中,包括了海内外已刊布和尚未刊布的史料。对日军方面,主要选择了日方已整理出版的日文战史资料、档案、大本营决策机关的会议记录等原始文件。其中部分日文新史料,是编选者约请天津编译中心新译出的。对正面战场,则充分利用了海内外的档案资料、台湾省的史政局编辑的百册《抗日战史》等资料。敌后游击战场则参考利用了已经出版的50余种各抗日根据地的资料选

编、汇编、专题资料、回忆录及中共中央文件集等众多的史料。为搜集众多的战史资料,主编者章伯锋先生披阅数载,焚膏继晷,因之酿成目疾,几近盲的边缘,其为学人着想的敬业精神,实令人深深感佩。至于史料之新,于下列数端可窥一斑。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史料,编选者从当时的档案资料,包括美国已解密的当时日本的档案资料,统计出南京大屠杀中,中国人民被杀害的达39万余人。由于编选者的工作,使这一统计数据具有相当的可信性,这是严谨的科学的态度。关于战争损失的统计,本卷所收资料,均极宝贵。不少统计资料来源于战争时期当时人的统计。其中揭巢出完成《抗战三年我公私损失初步估计》一文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潘嘉树先生是我国最先研究统计抗战全面损失的第一人,揭巢出韩启桐先生所完成的《中国对日战事损失之估计》,参考美国南北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估计法而设计出新的统计方法,这对认识战争损失统计的这些先行者在筚路蓝缕所开辟的战争统计途径和方法上的奉献,均极有价值。在战争索赔问题上,所搜史料力证其始末来源,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深刻认识和研究。难能可贵的是,编选者在1994年即编选出日本《读卖 This is》杂志当时发现的最新史料,天皇裕仁的最小的皇弟三笠宫崇仁亲王在1944年于中国所写的《作为日本人对中国事务的内心反省》文书和他写的《棉铁集》政论部分以及1994年对三笠宫的采访录。第一个文件在当时即被日本军部没收,对崇仁本人也下达了“籍口令”,一直尘封了五十年。现在发掘出来,这对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本性,对认识战争的性质,对认识中国人民的必然胜利和日本侵略者的必然失败,均有重要价值。特别是这些文件对日本政治军事侵略而外的文化侵略,亡国先亡魂,妄图毁灭中华民族文化的侵略野心,有着深刻的揭露,是极有价值的最新史料,值得认真研究。

二

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也起了一定的重要作用。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正面战场的地位和作用,是本卷史料重点反映的一个问题。对正面战场如何全面评价,有待于我们对本卷全部史料进行深刻的分析和研究。这里只就有关正面战场的地位和作用的几个问题,遵循本卷编选者的逻辑思路,谈谈我们的粗浅看法。

(一)关于正面战场的主要特征和什么是正面战场的主流问题。

由于正面战场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领导和指挥的,其战场主要力量又是由国民党军队承担的,因此,国民党及其军队的本质就决定了正面战场的主要特征。作为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国民党具有两重性,一面是参加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具有民族性,这一面是爱国的、进步的;另一面是具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腐败性、反民主性和反人民性。这两方面的性格,造成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努力抗战、顽强御敌与节节败退、丧师失地两种矛盾交织并存,互相影响、制约和转化的情况,这是正面战场的主要特征,也是当时普遍存在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客观事实。不过,这种矛盾交织的情况,在抗日战争各个阶段又有不同的演变。要而言之,抗战初期即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及其军队努力抗战、顽强御敌是其主流,积极对日军事作战是其军事活动和政策的重心,正面战场是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主阵地、主战场。因此,这一时期国民党广大将士在军事上积极迎战,努力抵抗日本侵略军的进攻,出现了像保卫平津、台儿庄大

捷、忻口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这样比较积极、努力抵抗后撤退的激烈战役,这是这一时期正面战场值得肯定的主流。但同时,也存在着丧师失地、节节溃退的问题。中日战争的持久战性质,敌强我弱的军事力量对比,使得中国不可能速胜。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在正面战场上不能阻止日本占领大批城市和交通线,这是不可避免的,无可厚非。国民党正面战场经过激烈抗战而撤退,不保守于一城一地之得失,有其符合于战争发展规律的一面。但问题在于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及其军队的虚弱本性,使它无法做到坚决的指挥和有计划的战略撤退,更无法依靠人民开展游击战和运动战,只知固守阵地战,而当固守不住时又惨痛溃散,这确是应该指责的消极方面。像广州会战那样的接战即逃、闻风溃退的可耻局面;像南京保卫战那样的指挥者唐生智时而请战死守,时而举止失措,五心不定,撤退失据,只顾自己逃命,最终使不及撤退的大批有生力量被堵死在江边的可耻局面,则是应该受到指责的。在抗战初期,这两方面相比较而言,积极抗战一面仍是国民党政策的主流,其力量也还是比较强的,是上升的。在抗日战争的第二阶段即中日双方战略相持阶段,随着力量对比的演变,日本军国主义把初期对国民党蒋介石“以击溃为根本方针”的政策改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政策,国民党蒋介石的两面性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虽然仍坚持抗战,但却日呈消极销减的趋势,而增加了对日谈判妥协的幻想成份,表现在军事行动上则是抗战规模和会战次数的下降趋势。据陈诚的《八年抗战经过概要》统计,正面战场先后进行的较大规模“会战”有22次,大小战斗约四万余次。其中,抗战初期一年的时间,从淞沪会战到武汉会战共有4次,每次参战的国民党军队在33个军以上。而1939年1月到1943年12月五年期间,先后会战仅12次,平均每年仅2.6次,参战的军事力量也在19个军以下。两相比较,会战次数和规模均在下降,说明国民党抗日积极性的下降趋势。而另一方面,国民党的积极反共性则随着日军政治诱降和军事逼迫压力

转向敌后战场而日呈恶性发展趋势,皖南事变是反共摩擦恶性发展的顶点。这一时期正面战场的主要特征是由积极迎战向被迫应战和消极避战转化。不过,也应该看到,这一时期国民党广大官兵仍有对日英勇作战的积极性。如南昌战役、南宁战役、宜昌战役和武汉冬季攻势,国民党的官兵仍是打得不错的。特别是三次长沙大会战广大官兵顽强战斗,英勇拼搏,第三次会战是以日军的失败和我军的胜利而告终的。这些战役,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收到了一定的遏制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的效果。以上两方面加以比较,国民党的积极抗战一面已由初期的主导地位下降到被迫应战甚至消极避战为主导的程度,其反人民一面则越来越上升,甚至恶性发展,这就使正面战场的力量包括军事力量也越来越弱,越来越走下坡路。这一时期正面战场在全面抗战进程中已逐渐居于次要地位而逐步让位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场,后者则逐步成为抗击日军的主战场和主力军。这是这一时期正面战场的主要特征。消极抗战与积极反共的矛盾交织与升降浮沉,是这一时期正面战场的主流。在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即我之战略反攻阶段,国民党军队的对日消极避战这一面普遍化,甚而恶性发展为不战逃战。如1944年4月至12月期间的豫、湘、桂战役,日军的兵力仅五六万人,就打败了拥有70万人的国民党军队,攻占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和贵州的一部大小城市146座,空军基地9个,侵占中国国土20余万平方公里,结果大大削弱了国民党战场在最后阶段对日总反攻的有利形势。这一时期国民党的消极避战向望风溃退的转化,是正面战场的主流,暴露了国民党蒋介石企图保存实力进行战后的反共战争的政治野心,也暴露了国民党与人民为敌,力量越来越虚弱的反动本质。由此观之,迎战——避战——逃战是抗日战争三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基本特征,是正面战场地位和作用演化的主要轨迹。

(二)对国民党参战的主要力量要具体分析,其抗战的积极性或消极性,坚决性或动摇性,是有区别的。作为国民政府的最高

首脑蒋介石与其下属是有区别的,将领中具有爱国性或是有卖国倾向是有区别的,上层将领与下层官兵的抗战积极性、坚决性是有区别的,军官与士兵是有区别的。大体说来,在国民党军队内部,越是下层,抗战积极性越高;越是基层,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的积极性越高。而越是上层,则其积极反共一面越是顽固,其消极性越是发展,这可以说是国民党力量发展的一个规律。还有一个重要现象,国民党军队牺牲阵亡的将领以军、师、旅三级干部最多,据《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重要战役介绍》一书统计,牺牲的军长李家钰、佟麟阁等共7人,牺牲的师长张自忠、饶国华等共29人,旅长共18人,团长共4人,飞行员3人,其它3人。这说明正面战场的军事行动的实际指挥者以爱国者居多,这是正面战场的主要指挥力量。而广大爱国的国民党官兵,尤其是爱国的下层军官和基层士兵,则是正面战场的主力。国民党的积极抗战一面,主要是他们带来的。对于国民党上层积极反共的倾向,他们是有抵制的。不少人又是同中国共产党积极合作的。认识这些特征,对于我们分析正面战场的基本性质是有助益的。

(三)中国共产党倡导和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民族革命的主要形式,它的基础是国共合作。在反抗日本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这一点上,即解决民族矛盾这一点上,国共两党都处在关键位置上,具有同样的地位和作用。这种特殊性,决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仅是政治力量的合作,同时也是军事力量的合作和互相配合与支持。在正面战场上,在华北方面的长城抗战、绥远抗战、冯玉祥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等问题上,特别是平型关战斗上,均有八路军对国民党军队的有力配合和支援。在东南方面,共产党先后与十九路军、福建人民政府建立了军事抗日的统一战线。在西北方面,共产党与东北军、西北军建立了西北统一战线,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这些合作的形成和发展,都主要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推动。正是抗日军事统一战线的形成,构成正面战场和敌后游击战场互相支持和配合的基础。这是正面战场,不管

有多大的软弱性而始终能够存在的根本原因。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军事上的成就,很有必要加以认真的研究。

三

敌后游击战场的形成与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与壮大,是本卷史料编选的另一重点所在。其史料的份量,与正面战场相同,这是本卷史料安排的一大特点。它与敌后游击战场由弱到强、由次要地位上升到主导地位的客观历史进程是相契合的。

敌后游击战场与正面战场在本质上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正面战场主要是解决民族矛盾的战场,虽也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加,但由于蒋政权对人民民主运动的限制和打击,因而正面战场不具有民主革命的性质。正面战场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基础,但由于国民党不相信人民的片面抗战路线而使这一基础受到极大的限制。而敌后游击战场,由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就使敌后战场不仅具有解决民族矛盾的民族性,而且使其敌后根据地成为民主革命的试验地,具有民主性的深刻内涵。例如,二五减租、三三制政权等,都是根据地政权所创造的民主形式。抗日战争是民族解放战争与人民民主革命进程相结合的特殊战争。共产党以高超的领导艺术使民族革命要求和民主革命要求,首先在敌后抗日根据地里结合起来。这是形式特殊的民主革命,是服从于民族独立、民族解放这一主要矛盾的民主革命。它为战后的新中国准备了雏型。同时,也正是由于民族革命性的鲜明,而使敌后游击战场具有不同凡响的坚定性和斗争性。本卷编选者对抗日根据地内部的民主改革进程给予了充分的注意,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

随着正面战场的消长起伏,敌后游击战场经历了由开辟到壮

大,由弱到强,由次要地位上升为主要地位的过程。本卷编选者对这一过程,分别在抗战的不同时期,与正面战场相协调,给予了充分的反映。

抗战初期是敌后游击战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阶段。早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初期即 1937 年 9 月,毛泽东同志即发出了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指示,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在这一方针指引下,我党创立了晋察冀、晋绥、胶东、冀鲁边、泰西、鲁西北、鲁中、晋察冀鲁豫等敌后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则初步开辟了苏南抗日根据地。东北抗日联军则在“九一八”事变后即开始开辟南满、东满、北满、绥宁等游击区和根据地。但这一时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还不是当时抗战的主战场,尚属于草创时期,孤立的小块居多,具有不稳固性。特别是东北,根据地建立了大大小小的十几个,但由于各个时期情况的变化,其中一些比较固定的游击根据地由于未能成片而在 1939 年左右几乎失去或被迫放弃,而未能长期坚守下去,只保存了若干军事基地和军事密营。但这一时期的敌后根据地已显示出对正面战场相互支持的重大作用。抗战中期的战略相持阶段,是敌后抗日根据地普遍发展壮大的阶段。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日军的“扫荡”、“清乡”、“治安强化运动”等极端困难的环境下成长壮大起来。在整个战略相持阶段,正面战场逐步降到抗敌的次要地位,而敌后战场则上升到主要地位,成为日本侵略军进攻的重点。这一时期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担负着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大多数力量的任务。通过战略相持阶段的考验和发展,华北敌后战场如晋察冀、晋绥、山东、晋冀鲁豫等根据地,华中各师的根据地,新四军所开辟的苏中、苏北、淮北、豫皖苏、皖东、鄂豫皖湘赣等十几个敌后根据地,浙东抗日根据地,华南的东江、珠江、琼崖等抗日游击区和根据地,都在经历严峻的困难和考验后,得到长足的成片的发展。而百团大战则显示了敌后抗日根据地作为抗战主力军逐步代替正面战场的主要地位而崛起的重要作用。到战略反攻阶段到来时,